

绥阳知青

包信宜



政协贵州省绥阳县委员会 编



绥阳知青

包信宜

政协贵州省绥阳县委员会 编

《绥阳知青》编委会

顾 问：刘之礼 黄万邦 杨泉生
主 任：钟方伟
副 主 任：董清学 贾莲霞 张绍春 王 琳
 何 俊 骆书涛
委 员：白俊恒 冉光宇 李立江 吕金华
 谢万琼 周瑞林 卜宗学 崔笛扬
 黄明仲
主 编：张绍春
副 主 编：冉光宇 李立江 吕金华（执行）
编 辑：周瑞林 卜宗学 崔笛扬 黄明仲
审 校：张绍春 白俊恒

前 言

四十多年前，一场声势浩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展开。我县广大知识青年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与来自上海、贵阳、遵义等大中城市的知识青年一道，怀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心和热情，纷纷走出学校，上山下乡，到农村插队落户，为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和努力，为农村带去了城市的某些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使许多偏僻闭塞的农村第一次受到了城市文明的影响，使许多农民及子女第一次感受到现代文明。同时，广大知青通过在农村的艰苦锻炼，培养了不怕苦不怕累、不怕困难与挫折的意志品质和为祖国、为人民勇于献身的奋斗精神。

为了不使知青们的这段宝贵经历无声湮没，为了缅怀那些难忘的青春岁月，给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充分发挥文史资料“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作用，绥阳县政协决定编辑出版这本《绥阳县文史资料第十七辑·绥阳知青》。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广大知青和社会各界人士，以“亲历、亲见、亲闻”的笔触记录那段历史，真实反映了曾经在绥阳境内上山下乡的广大知识青年在农村与农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亲身经历和走上工作岗位后，留恋“第二故乡”心系绥阳的真情实感，使知青精神得到进一步弘扬，成为激励后代的宝贵精神财富。希望通过本书的出版，留住那一段难忘的记忆，增进老知青们在经济建设、文化交流、社会进步诸多方面的沟通联系，广泛交流，为绥阳经济社会又好又快、更好更快发展献计出力，做出新的贡献。

编辑出版一本多由知青们自己撰写的、真实反映我县知青生活

的文集，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好事。以此记录绥阳知青们的理想和激情，展现知青这一代人在人生之途上艰难跋涉的风采，同时也毫不隐晦地诉说这一代人有过的困惑和付出的代价，无论对知青们，还是对知青们的子女以及对整个社会来说，都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

《绥阳知青》既是一本属于知青一代人的书，因为它的作者主体是知青们自己；但又不仅仅是属于知青一代人的书，因为它包含的内容比较丰富和广泛，它真实地反映了那个年代知青们的特殊经历，它是知青们奉献给每一个关心知青生涯的人们的珍贵礼物，它是知青们献给绥阳这片梦绕魂牵的乡土的眷恋，它是一幅历史的画卷，展现了一代人不怕苦不怕累，敢于与困难挫折抗争的意志品质和精神风貌，展示了昔日知青们在绥阳这块热土上顽强拼搏的奋斗历程。

值此，仅以本书编者的名义，向为我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献出了人生最宝贵青春的知识青年们致以崇高的敬意！深深感谢各位作者以巨大的热情和执拗的努力所付出的艰辛劳动，感谢绥阳县档案局的大力支持，用一篇篇文稿及珍贵的档案材料还原了一页真实的历史，采掘了一枚足以留给未来世界考证的精神化石，留给后人一份十分难得的宝贵精神文化遗产！

编 者

2013年9月

目 录

- 1 绥阳知青运动始末 / 吕金华
- 10 我们成为知青的依据 / 刘之礼
- 13 知青岁月记忆 / 卜宗学
- 16 绥阳首批知青下乡记 / 黄继贤
- 22 难忘的双龙“青年队” / 丁正伟
- 31 从农场到农村 / 笪斯志
- 37 绥阳情怀 / 赵丞麟
- 53 解读《绥阳情怀》 / 李达武
- 56 我记忆中的两个上海知青 / 李立江
- 64 马君强回馈第二故乡 / 张亚尔
- 66 曹建林的知青岁月 / 陈晓红 黄光祥
- 72 我所了解的吴万寅同志 / 黄明仲
- 78 心系诗乡情更浓 / 田天威
- 82 在坚持乡村的道路上 / 崔笛扬
- 85 清源公社党委克服“差不多”思想继续抓紧“再教育”工作
/ 崔笛扬（供稿）
- 87 战斗在广阔天地里——记在绥阳县插队落户的几个知识青年
/ 王周德 崔笛扬（供稿）
- 91 我在金坪公社的知青生活 / 陈正浩
- 95 家住上海知青 / 杜兴成
- 100 难忘大湾沟 / 林茂前
- 105 难忘的知青经历 / 刘之礼
- 108 磨砺奠根基 / 黄万邦
- 115 我在永山当知青 / 杨泉生
- 122 那个年代的青春岁月 / 贾莲霞

-
- 125 终生受用的历练 / 杨春院
- 131 厚重的烙印 / 杨 明
- 137 走出一串坚实的脚印 / 夏一军
- 141 一段难忘的人生经历 / 徐国萍
- 145 我上山下乡的日子 / 姚元碧
- 151 我在宽阔的知青时光 / 李荣强（代笔）
- 155 我在高山当知青 / 笪斯勇
- 161 难以忘却的记忆 / 蒋定方
- 166 我的“农民生活” / 周瑞林
- 179 追忆峥嵘岁月 / 吕国生
- 186 秋后算账 / 黄继贤
- 189 为了那点“救济粮” / 徐久远
- 192 苦中作乐 / 张贵华
- 196 挣工分 / 长 水
- 199 一个知青的感悟 / 程昌林
- 203 遥远的记忆 / 张颂平
- 208 那山可还记得我 / 刘华英
- 211 我的知青生活点滴 / 徐久长
- 216 滚泥巴祭 / 郭远庆
- 222 磨 炼 / 冯晓峰
- 226 我的知青生涯 / 杜兴权
- 237 我与知青 / 汪德贵
- 243 永山村知青生活琐记 / 吴仲华
- 246 我们村里的五位知青 / 韩述华
- 248 知青生活趣事 / 付光先
- 251 知青往事 / 胡元文
- 258 我的知青日记 / 周瑞林
- 261 桃子坝的银杏树 / 徐久长
- 263 桃子坝旧事 / 徐久远
- 273 缭绕山乡的知青歌谣 / 蒋定方

-
- 277 一个知青的家 / 吕国生
278 田天威诗词十首 / 田天威
282 林茂前诗歌两首 / 林茂前
284 徐久长诗词五首 / 徐久长
286 周瑞林诗歌五首 / 周瑞林
290 当年知青回宽阔 / 姚思强
292 致回访宽阔的知青们 / 李荣强

附录:

- 293 落户绥阳的上海知青名单
297 历史照片

绥阳知青运动始末

吕金华

20 世纪 50 到 70 年代，一场史无前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中国大地展开，绥阳也不例外，接纳了来自上海、贵阳、遵义等地，以及本县非农户口的知识青年到各生产队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演绎了一部绥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大剧。

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产生的历史背景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产生，主要有三大原因：一是因为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就流行一种教学思潮，即摒弃传统教学，过分提高实践的作用；二是很多人带着积极的理想主义色彩，认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可以消灭工农、城乡、体力与脑力劳动这三大差别；三是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了两年后，中国各个领域一片大乱，政府机构瘫痪了，工厂停工了，学校停课了，领导成了敌人，人与人之间空前对立，派别林立，还发展成了真枪实弹的武斗，城市已经无法安置 1966、1967、1968 连续三届的 2000 多万中学毕业生，无所事事的红卫兵们成了破坏的巨大力量，现实十分严峻。

在前两种原因的作用下，中国从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就有了零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现象。1955 年 8 月 30 日，60 名北京青年组成了青年志愿垦荒队到条件艰苦的黑龙省农村去垦荒。此举得到党中央的鼓励，并在青年人中大为宣传，成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起点。1957 年，毛泽东在为河南省郑县大李庄乡合作化经验的按语中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从而进一步肯定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做法。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两年后，即 1968 年 12 月 22 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在该文编者按中披露了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最新指示。接着，各级政府就组织了大量城市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去农村定居和劳动，一场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

二、四千知青到绥阳上山下乡插队落户

绥阳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始于 1964 年。那年 8 月，洋川区域城关公社传达省农业厅转发国家农垦部门向全国城镇闲散人口发出的一个倡议书，号召有劳动能力的城镇闲散人员到农村去参加农业劳动，减轻国家负担，不在城市吃闲饭。11 月份，应届初中毕业的女青年梁启容向城关公社申请，志愿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当一名新农民，就这样，她成了绥阳第一个下乡的知青。城关公社紧接着利用梁启容这个典型事例，在各居委会向知识青年大力宣传，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65 年 4 月 7 日，洋川区域城关公社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动员大会，强调：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的号召，上山下乡是大势所趋，是防修、反修，巩固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有力保证。4 月 22 日，23 人的绥阳第一批知青开赴了团山公社插队落户。这 23 人，加上已下乡的梁启容，刚好男女各 12 人。

在第一批知青下乡的带动和县里的动员下，1965 年 9 月 1 日，又有 39 名知青上山下乡，其中 34 人到了双龙公社集体知青点，男女各 17 人，另有 5 人到雅泉公社永山大队插队落户。双龙知青点由于是集中在一起的青年人，所以被人们称为“青年队”。

1966 年 8 月，县里在雅泉公社办了个“绥阳县五七青年农场”，将遵义和绥阳知青 70 人集中在这里劳动。1967 年 4 月，县里撤掉

了双龙知青点，将双龙知青点的 34 名知青安排进了“绥阳县五七青年农场”，使这个农场的规模达到了一百人以上。

绥阳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兴起于 1968 年，那年的 3 月 5 日，县革委决定成立绥阳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安置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 7 人组成，并下设了办公室，即知青办。

1968 年 10 月 16 日，绥阳中学革委会在人民剧场召开大会，宣告上山下乡运动开始，600 多名农村知识青年胸戴大红花，手捧《毛泽东选集》，带着毕业证书和“上山下乡光荣”证书，踏上了返回家乡当一名“新式农民”的路程。

1968 年 11 月 15 日，全县 156 名居民户口的知识青年，相继分赴各地插队落户，他们中最小的不到 16 岁，最大的约 20 岁。对这 156 名下乡知识青年，采取的是自行联系接收生产队分散落户和集中统一定点两种方式安置。绥阳中学下去的知识青年，主要安置在黄视区中坪乡的红旗、青沟、拥德等大队，每个知青点 3 至 5 人，有的住在农民家，有的住在当地小学，还有一个知青点设在废弃的寺庙里。后来，一些有条件的生产队先后为知青们修建了知青房。11 月 20 日，旺草中学也欢送了第一批知青到萝柏公社插队落户。除 1966 年到“绥阳五七青年农场”的遵义知青外，1968 年下半年起就陆续有遵义知青到绥阳插队落户，例如 1968 年 11 月 15 日有一批遵义四中的知青到绥阳的郑场区各公社插队落户，1968 年 12 月 10 日有一批遵义知青到宽阔公社插队落户。贵阳知青也陆续到达绥阳。

1968 年 12 月 28 日，县革委解散了“绥阳县五七青年农场”，把所有农场的一百多人重新安排下乡，到离县城一百多公里的野茶、后槽公社安家落户。

1969 年 3 月 25 日，600 名上海知青到达绥阳。

此后，绥阳上山下乡的知青多是绥阳本地非农业户口的初高中毕业生，也有少量未毕业的初高中学生，贵阳、遵义知青也有零星到绥阳来插队落户的。

直到 1978 年 10 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

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绥阳才再没有安排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据不完全统计，上海、贵阳、遵义和本县非农户口的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知青共约 4000 人，还有大批从农村来回农村去的回乡知青。

三、绥阳下乡知青安排工作的基本情况

为解决知青在生产、生活方面的困难，各级党政组织采取了很多措施。知青下乡的第一年，县里发给了一定数量生活补助费和定量供应的粮食，以及一些生产、生活用具。生产大队、生产队也从人力、财力、物力上给予了积极支持，每人都划给了自留地，在劳动中实行与生产队社员同工同酬。为加强管理，县里设有专门的机构——知识青年工作办公室，各区、公社有专人负责协调解决知青方面的工作。

为使知青安心农村，上海市于 1971 年底组织了十多人的慰问团来绥阳，深入各知青点对上海知青进行慰问。慰问团对各知青点的安置情况和知青生产、生活、思想方面的情况进行了全面了解，向政府反映了一些知青的迫切要求。慰问团的到来和辛勤工作，对稳定知青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以后，上海市还于 1972 年、1976 年、1977 年等多次组织慰问团前来绥阳慰问知青，了解知青生产、生活、学习及招工安置等情况。

到 1970 年 10 月左右，对知青的有关政策有了新规定，满两年的可以报名应征入伍，劳动部门已开始对表现好的知青进行招工。于是，决心“扎根农村一辈子”、“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的知青队伍出现了新的流向，有的参军入伍，主要在贵州军区的独立师、野战军 40 师和 42 师；有的于 1970 年底参加绥阳民兵团，开赴镇远县，修筑湘黔铁路；有的经各级推荐，由劳动部门招工参加工作，主要去向是 061 系统的各厂矿和县内一些边远小学，还有的知青考入绥阳师范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小学任教。余下的知青，从 1971 年开始，从各个渠道招工参加了工作，如赤天化、开阳磷矿、清镇化肥厂等，都在绥阳招录了一批知青。湘黔铁路修筑完工以后，该团的部分知

青成了铁路工人。由于婚姻、家庭等原因，有极个别的知青失去了招工升学机会，至今仍生活在农村。

1975年3月，第一批入伍知青退伍了。当时的退伍军人安置政策是：1972年以前的退伍军人，不论城镇还是农村，都要分配工作。1973年以后，停止在农村退伍军人中招工。因此，对第一批退伍知青，政府按“哪里来回哪里去”的原则，他们应回到入伍前所在生产队去。区、公社则反映，知青都走得差不多了，要重新进行安置，困难很大。而这些退伍知青则认为，没有当兵的都安排了工作，而支援国防，保卫祖国的，反倒不能安排工作，所以很有情绪。7月份，几经周折，县里终于改变了原来回农村安置的意见，改由劳动部门安排工作。于是，有的到了3535、3532等厂，有的则到了县机关。从此，知青退伍军人工作的安置逐渐形成了规范的政策和制度。与此同时，政府还对知青参加工作后的有关待遇进行了明确：参加工作后不再有熟练期，一年后直接转正定级，下乡时间计算为工龄。到1976年，第二批退伍知青也得到了妥善安排。后来下乡的知青，也陆续得到多渠道的妥善安置。除了定居农村的以外，绥阳在乡下当知青最长的14年，即1965年4月到1979年。

至于众多的回乡知青，由于他们返回各自的家乡，在心理、生活、生产条件上遇到的困难都比下乡知青小得多，很快就适应了。由于户口本生在农村，不存在安置问题，任其自由发展。

四、绥阳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生活状态

城市知青下到农村，要跟农民一起学会犁田插秧、挑粪上山、扛抬木头等重活，还要做烧火做饭、洗衣挑水、打扫卫生等家务，而且他们的年龄均只有十五六岁到二十岁左右，没有生活经验，其艰难程度是很难细说的，但许多知青也能经常聚在一起苦中作乐。

有的知青在当地是能歌善舞的文艺宣传骨干，活跃了地方文化。如永山村就以下乡知青为主成立了“永山村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自编自演了许多文艺节目，还在上级汇演中拿过奖。1969年春夏，上海知青田天威、张亚尔，遵义知青王素芳，绥阳下乡和回乡知青

李发模、杜兴成、叶桂林、江世明等，组成了“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创作组，常常相聚进行诗歌创作，后来李发模、杜兴成分别成了全国闻名的诗人和音乐家。

有的知青利用他们所学的知识和个人专长，成了赤脚医生、电工、代课老师等，服务于农村和农民，受到广泛欢迎。

但一些知青思想处于迷茫之中，看不到前途。如“绥阳五七青年农场”的知青，就曾到遵义、贵阳、北京上访，要求放他们回去。还有的走上了邪路，干起了坏事，最后犯了罪，其中有一人因杀人致死，被判了死刑。还有一人，因生活始终无法自理，导致了精神失常。少数女知青的生活状态很艰难，甚至遭到了性侵害也无处申诉。

知青们的婚姻生活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双知青型、知青加农民型、知青加干部（职工）型。有的知青与当地农民结婚了，或者有了孩子，但因为急于回城，丢下了伴侣和孩子，成了破碎的婚姻，演绎了许多悲欢离合的故事。也有个别的因婚姻关系，成了一辈子的农民。

也有的知青在生活和劳动中挺立起来，成了学习的榜样。樊亚东苦钻医术当上赤脚医生、瞿鸿妮为生产队当好保管员、丁大均乐当羊倌等事迹，还登上了《贵州日报》等报刊。1973年，夏美珍决定留在贵州，不回上海，各级组织利用此事，加大宣传，教育广大知识青年，《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贵州日报》也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将这一行动称之为“向资产阶级法权开战”的革命行动，此事在社会和广大知青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还有个别知青在生产劳动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总之，知青们在农村的生活，以艰苦和无助为主要特点，但其中也有不怕困难、努力上进的乐观一面。

五、梅花香自苦寒来

当年只读过初中的下乡知青夏一军，后来成了《遵义日报》的高级记者，写下了几千篇新闻报道，50余次荣获全国和省、市级新闻大奖，他说得好：“是知青的命运练就了我的意志，是知青的生活给了我无穷的力量。”

在绥阳当过知青，意志得到磨砺，后来卓有成就的大有人在。

上海知青袁望治，于1969年3月到1971年插队在绥阳县雅泉公社福兴三队，后安排到贵阳钢厂等处工作，工作后入贵州工学院学习并留校一路晋升至教授、硕士生导师，其间又入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获理学硕士学位，入瑞士苏黎士大学做国家教委访问进修学者，1999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1—2009年，在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做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至退休。是到绥阳下乡的上海知青中的学者型佼佼者。

上海知青马君强，1969年3月从上海到绥阳县洋川镇达木村插队落户，现为加拿大3L Dynamics inc总裁，中加体育促进会名誉会长。

上海知青曹建林，1969年3月从上海到绥阳县郑场区插队落户，现为遵义市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遵义市委主委、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

贵阳知青张若谷，在温泉区农村劳动锻炼后，于1979年考入贵州省师范学院读书，毕业后留校任英语教师。2003年出国在瑞士伯尔尼大学学习深造一年，2004年又去英国学习半年的翻译，2008年国家“汉办”在全国遴选上百人到近百个国家任教，用英语传播中国文化，教中国的历史、文学等，并在国外办孔子学院。他被国家“汉办”选到克罗地亚萨格勒布大学任教3年，直到2010年6月才回到现在的单位。

象他们那样卓有成就的绥阳下乡知青很多很多，一是因为文字所限，二是因为当年的很多知青的情况已经无法获知，所以本文不能一一列举。

六、割不断的“故乡情”

离上海、贵阳、遵义知青到绥阳插队落户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当年的知青们虽然早生华发，但仍然忘不了他们的第二故乡绥阳。

2009年3月21日，当年从杨浦区到贵州绥阳县插队落户的上海知青共200多人在上海长阳路上的妮妮饭店欢聚一堂，纪念赴绥

阳插队落户 40 周年。一些上海知青听到聚会的消息时，从加拿大、北京、澳州、贵阳、遵义、长沙等地专门赶过来，为的只是看一看当年的插兄插妹，听一听绥阳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忆一忆那个年代的往事。还邀请绥阳县四大班子领导参加了这次活动。这次活动后，赵亟麟、姚福娣、周旦华、王亚元等当年在清源公社插队的知青，一起回了一趟第二故乡，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看望当年的父老乡亲。在黄沙生产队两年多的时间，他们吃过家家户户的饭菜。有一年过春节，家家户户杀年猪，他们几个知青吃了这家吃那家，这种记忆永远都在他们心中珍藏着。请老乡们出来喝喝酒，吃吃饭，是他们心中一个久远的愿望。他们来到绥阳，约了一直留在绥阳的上海知青戴敏，以及当年的遵义女知青胡世琴、唐淑燕、姜维等一起上山，在清源黄沙生产队钟家大院摆了几十桌酒席，和当地老乡一起边吃边回忆往事，其情殷殷。

近几年，当年的上海知青马君强，从加拿大回国完成了几件很有意义的事：自 2009 年至今，他捐资 90 万元人民币，对绥阳的 300 名高一级学生实行整届资助；他委托绥阳县教育局代他转赠 200 套校服给他当年插队的达木村幼儿园孩子们；他还为绥阳中学从加拿大请来了外籍英语教师。他还表示，将给绥阳做更多有益的事情。

2012 年 8 月 4 日，三十多名遵义知青回到宽阔镇，参加了宽阔镇举行的“重走知青路，共商故乡发展”座谈会，与当年的朋友话亲情，为故乡的发展献计献策。

象这样不忘第二故乡情，反哺第二故乡的事情，在外地来绥的知青中还有很多很多，难以详述。

七、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反思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令无数城市青年接触了广大农村。有人认为，上山下乡运动，缓解了因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城市就业压力，达到了解散红卫兵组织，和让年轻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目的，但却使约 1800 万年轻人青春荒废，家庭散离，带来了各个层面的社会混乱，甚至因为他们失去了受教育的最佳时机，在上世纪 90 年代

多因下岗而失业。许多本可成为专家学者的年轻人成了一般人，带来了上世纪 80 年代的知识断代现象。

当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与了农村的教育事业，使农村的识字率和入学率大增，使广大农村的人均教育水平获得了极大幅度的提高，对农村教育普及也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不少知青认为在农村的艰苦生活磨练了他们的意志，了解了生活，为今后成就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也有人放弃了曾经坚信的马列主义革命理想，终生处于抱怨之中。

有人认为上山下乡运动是毛泽东为加强工农联盟基础、教育青年、消灭城乡差别的一个重大尝试。同时知青下乡对于农村的教育普及、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以及乡镇企业的建立都起到决定性作用，大幅度改变了农民面貌。

总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命运，也使整个中国社会走过了一段曲折的弯路。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重点参考了蒋定方《绥阳县上山下乡运动始末》、当代中国出版社《中国知青史》，以及部分知青的回忆录、相关新闻报道等文献，并采访了当年绥阳知青办干部龚世华等，综合写成。在此一并表示感谢！）